

陈贻庭 主编

台湾古诗选

陈贻庭 张宁 陈丽 选注

南明时期至二十世纪初叶

七十三位诗人一百八十首诗作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台湾文学史话

台湾古诗选

——
——
——

编者：陈国凯、陈正雄

□ 陈貽庭 主编

台湾古诗选

陈貽庭 张宁 陈丽 选注
南明时期至二十世纪初叶
七十三位诗人一百八十首诗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古诗选 / 陈貽庭主编.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6.8

ISBN 7-80195-517-X

I. 台… II. 陈…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7324 号

台湾古诗选

作 者	陈貽庭 主编
出 版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680 × 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9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517-X / I · 314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谈到台湾文学，大陆读者了解比较多的是它现当代的情况，对其古代文学，一般人可能知之不多。其实台湾的古代（包括近代）文学特别是它的诗歌也是很值得关注的。虽然台湾古典诗歌的历史并不长，从南明时算起至20世纪初叶，只有不到300年。然而就在短短的近300年间，它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至少到清代中期，其整体艺术水平已达到与大陆相当的程度。到了晚清，当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古诗创作已日渐式微时，台湾诗坛仍然显得非常活跃。当时岛内单是有组织的诗社就有数十个（一说逾百），其成员达数百人之多，作品数量亦十分可观，甚至还出现了像丘逢甲这样具有全国性声誉和影响的大诗人。这是台湾古诗值得关注的原因之一。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它的文化脱胎于中华文化的母体，因此它的古诗无论是取材范围、表现形式，还是艺术手法，审美趣味，也都与祖国大陆一脉相承。但是由于台湾的地理位置、民俗风情和近代的历史遭遇比较特殊，也使得它的古诗呈现出一些独特的风貌。这是台湾古诗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台湾的古诗，滥觞于南明时期。南明永历初，出

生于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的南明太仆少卿沈光文辗转漂泊，来到当时郑成功抗清的根据地福建南部，落脚于金门岛。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的一天，他正乘船准备去泉州，不料航行至海口围头洋时，船遇上大风，他因此漂流到了台湾，并最终在台南定居下来。沈光文擅长文学，来台湾后，常常以诗作记述流亡境况，抒发乡愁归思，这些作品就是台湾岛内最早的一批古诗。康熙廿四年（1685），他又和当时的诸罗县令季麒光等13个人组织了“东吟社”，开台湾诗人结社之先河。季麒光在《题沈斯庵杂记诗》中说：“台湾无文矣，斯庵（沈光文号）来而有文矣。”这个被誉为“海东文献初祖”的人，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最早的诗人，他也因此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一大批明朝遗民随之陆续登上这座宝岛，其中不乏像沈光文这样著名的文人，如卢若腾、徐孚远、沈佺期、王忠孝等。他们和沈光文一起在这片土地上播撒中华文化的种子，以其丰富的经历、深沉的情感和娴熟的技巧从事诗歌创作。台湾的古诗可以说是由他们直接从祖国大陆移植而来的，因此尽管其历史短暂，但起点却不低，从一开始就显得成熟。这些明朝遗民诗人作品所描写的主要是个人的境遇和情感，归纳起来大抵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羁居海外的艰苦生活和感受，思念故国又无力恢复的无奈之情以及有家不得归的强烈乡愁。由于这些人多数曾经居朝为官，锦衣玉食，如今国破家亡，退居异域，尽管明郑政权以礼相待，然而其处境与以往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为了生存，一些人甚至不得不耕作渔樵。生活的巨大反差使他们感受强

烈，因此他们的诗中对艰难处境的描述和感叹很多。他们效忠于明王朝，不愿仕清，但是势单力薄，恢复无望，因此只能在诗中对前朝空怀眷恋之情；而漂泊异乡的生活，又使他们的诗歌必然充满思乡的情怀和有家难回的愁苦。

遗民诗人中，较著名者除了沈光文以外，还有徐孚远和卢若腾二人。沈光文在台湾生活的时间较长，一直到清朝统一台湾后才辞世，因此他涉及台湾的作品也比较多。他的创作特点是不事雕琢，自然明畅，意蕴深沉，其中诸多思乡之作写得尤为感人。除了本书中选录的《思归》，又如《赠友人归武林》诗：“去去程何远，悠悠思不穷。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望月》诗：“望月家千里，怀人水一方。每逢北来客，借问几时还。”也都是表达绵长深沉的乡思的。这类作品成了日后台湾乡愁文学的滥觞。

徐孚远早年曾与夏允彝等组织几社，南明时又与张煌言、卢若腾、沈佺期、曹从龙、陈士京重结几社，号称“海外几社六子”。他的创作数量可观，现存有2700多首诗。不过他在台湾生活的时间只有4年，因此涉台诗歌不多，其内容也以写遗民生活和情感为主，所不同的是他在颠沛流离的困顿中仍努力保持了古典诗歌的正统品格。为此连横称赞说：“闾公（徐孚远字）之诗，大都眷怀君国，独抱忠贞，虽在流离颠沛之时，仍寓温柔敦厚之意。人格之高，诗品之正，足立典型，固非藻绘之士所能媲也。”（《台湾诗乘》卷一）他的诗喜用典故，但并不让人感到晦涩沉闷。

卢若腾的特点是擅长写古体诗，作品内容不囿于一己之遭际，而是直接触及到了当时的现实。他在明

郑的根据地生活了将近20年,对当地情况和郑成功的军队有较深入的了解,其作品对明郑收复、开发台湾的艰辛及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都有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可以作为史料来读。他的《南洋贼》诗控诉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罪行,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较早的一篇反帝作品,也很值得关注。卢若腾的纪实诗风,对后世台湾诗坛有一定影响,比如从日据时期著名诗人洪弃生反映现实的叙事诗中,就可以看出对卢若腾诗风的继承和发扬。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统一台湾,台湾诗歌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清治前期,台湾还缺乏本地人才,要从大陆派遣官员前去管理。被派往台湾的大多是文官,其中不乏文学之士,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文人以各种身份、因不同缘故来到台湾。这些宦游人士新来乍到,在讴歌国家统一的同时,也深深地为祖国东南沿海这块美丽的土地所吸引,对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居民充满好奇,于是他们四处游览观光、采风问俗。尤其是乾隆、嘉庆年间,宦游诗人激增,描写台湾风物的诗歌也因此盛行于一时。这股风气一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宦游诗人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康熙、雍正时期较著名的有高拱乾、郁永河、阮蔡文、陈梦林、蓝鼎元、宋永清、孙元衡;乾隆、嘉庆年间则有张湄、六十七、范咸、钱琦、朱仕玠、杨廷理等。迈入道光后,虽然宦游诗人的势头有所减弱,其地位逐渐为本土诗人所取代,但仍有姚莹、刘家谋、林豪、查元鼎等一批宦游人士活跃在台湾诗坛上。他们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材,是台湾的山川景物。连横对此有精彩的表

述：“夫以台湾山川之奇秀，波涛之壮丽，飞潜动植之变化，可以拓眼界，扩襟怀，写游迹，供探讨，固天然之诗境也。以故宦游之士，颇多撰作。”（《台湾通史·艺文志》）此外，台湾居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风情，也是他们作品中描写的重要内容。宦游诗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虽然远离家乡，在台湾的生活条件也不很优裕，但处在一个相对太平的时期，没有早期遗民诗人的丧乱流亡之痛，因此写起诗来也就没有遗民诗人的那种悲闷压抑，比较放松洒脱，不少作品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他们的作品也扩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容，向人们展示了宝岛壮美的山海景观、丰盛物产及当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使人们加深了对台湾的了解和关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他们也缺乏本地文人所具有的那种家园情怀，对台湾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往往多于亲切，对民生疾苦更是缺乏深入的体验和关注。

宦游诗人中，有以下几位比较值得注意。一个是高拱乾。他曾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任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兼理学政，可谓文武兼通。他在台履职四年，在同级别官员中算是比较长的。其间主持修纂了《台湾府志》，为台湾的文化事业做了一项重要工作。他还写过一篇《台湾赋》，也传诵一时。他的诗艺术上并不突出，但写景的题材选得有特色，比如《台湾八景》诗就属于开创性之作，对台湾后来的写景诗有一定的影响。谢金銓《续修台湾县志》说：“岛上谈诗，名宦则以高观察、孙司马为最。”高观察即高拱乾，而孙司马指的是康熙中期担任台湾海防同知的孙元衡。将二人的诗歌相提并论，其实并不恰当。孙元衡在文

化建设方面没有高拱乾那样的成绩和名气，但其诗歌的成就和水平却远胜于高拱乾。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禛（号渔洋山人）点评过他的很多作品，认为它们可以与韩愈、苏轼的作品相媲美，虽然过誉，却也说明孙元衡的诗歌的确不同凡响。他的诗特别是写台湾山海景观的作品，风格奇险，笔力雄健。题材广泛也是他的特点之一。除了山水景物，他还有不少作品描写到农村生活，对民生的痛苦也有所反映。比如《咏怀》30首之一写道：“大田本多稼，淹化麋鹿场。官府日夜急，徒为后世殃。食力且不给，荣利焉能长？”揭露官府强令将稻田改作养鹿场，致使农民生活无着，祸及子孙。有人评价说孙元衡的诗“通于政事”（《赤嵌集·张序》），可见他跟一般的吟风弄月之辈不同。

以上是康熙时期两个比较重要的宦游诗人，乾隆年间值得关注的则有张湄和钱琦。张湄乾隆六年（1741）迁巡台御史。在台湾的时间虽只有一年多，但他重视文教事业，创设了海东书院。这所书院后来成为台湾重要的学堂，培养了很多本地人才。他还亲自到书院讲学，并将学生课艺作品编为《珊枝集》印行，以鼓励诗歌创作。他本人也工诗，连横称他“蜚声艺苑，诗多可诵”。（《台湾诗乘》卷二）他在台湾的代表作是《瀛壖百咏》，自序中说：“余奉使持节是邦，自厦抵台，自郡治讫南北二路，即志乘所载，合之巡历所经，凡岁时、习俗、山川、草木、禽鱼之类，苟有可记，辄赋短句……”可见该书的题材亦不外台湾风物之类。但他的诗比较讲究意境，用笔清简而富有韵致。本书已选录了他的几首诗作，再看这一首《龙湖园》：“湖波如镜寺门幽，面面晴峦空翠浮。寂历辋

川图画里，柳烟花雨不胜愁。”又如《北香湖》：“十顷红云贴水铺，藕花深处乱鸥凫。北风凉动香愈好，得似西湖六月无？”都写得有境有意。钱琦和张湄一样，也在乾隆年间当过巡台御史。他与著名诗人袁枚是至交。袁枚对他的诗赞赏有加，特别指出其在台之作“尤为雄伟”。这个评价放在他的《泛海》诗上是很贴切的。这首诗写海情的变幻和航海历险，惊心动魄，格调也高昂，算得上是中国诗歌史上同类题材中的出类拔萃之作。

进入道光以后，因为形势的变化，除了像刘家谋这样少数专写采风诗歌的作者外，其他宦游诗人的作品已不再局限于地方风物民俗，而是有了更宽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主题。

清朝统一台湾后，即在岛上设置官学，各地的书院也蓬勃兴起。官府的推动和民间的努力，共同促进了本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加上科举制度的助力，台湾本土诗人于是应运而生。现在说不准谁是岛上最早的本土诗人，不过台南的陈辉被公认是较早也较有影响的一位。他是乾隆三年（1738）举人，曾参与重修《台湾府志》，史书称他“夙耽风雅，诗文并茂”。（《台湾省通志稿》）不过本土诗人在创作上的成熟，还是在章甫出现以后。这位足不出闽台，大半辈子默默无闻在乡间课徒授学的教书先生，作诗的才情却很高。他的诗苍朴浑厚，气韵高古，法度谨严，把台湾诗歌的艺术水平迅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台湾本土像他这样厚重高古的诗人并不多，后代大概也只有洪弃生、林朝崧和丘逢甲等少数人能与之媲美。到了嘉庆以后，本地出生的诗人逐渐增多，台湾诗坛也因此呈

现出本土诗人与宦游诗人并驾齐驱的局面；近代以来，本土诗人更成了台湾诗歌创作的主体力量。

台湾本土诗人的创作，大致可以甲午战争和次年台湾被日寇侵占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他们的作品仍以游赏、述怀、酬答、怀古等传统内容居多。但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台湾，对社会生活和百姓疾苦有更多的了解和关切，因此作品也较宦游诗人更贴近现实。比如陈辉的《买米》诗，描写台湾由“产米乡”到“无米炊”的变迁，以此反映官吏的剥削和民众的困苦；蔡廷兰的《请急赈歌》写道光十一年澎湖大旱的凄惨情状，并在诗中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即使同样是写台湾景物，本土诗人在欣赏赞美之中，也往往多了一份温馨的家园情怀。

甲午之前台湾较著名的本土诗人，有乾隆时的陈辉、章甫、卓肇昌，嘉庆以来的郑用锡、蔡廷兰、陈肇兴、陈斗南、林占梅、陈维英、施琼芳等。康熙时期，台湾的经济和文教以南部地区较为发达，因此早期的本土诗人如陈辉、章甫等多出自这里。雍正、乾隆之后，北部逐渐得到开发，文教的重心也逐步北移。到了道光末年，北台的淡水、新竹一带诗风大盛，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诗人，其中尤以郑用锡、林占梅、陈维英最有影响。郑用锡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他与林占梅同为新竹富绅和著名诗人，不过二人诗风有很大的不同。郑用锡的诗以写实居多，呈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达观和淡定；林占梅的作品则以抒写性情为主，充满伤感之音。艺术上林占梅比郑用锡胜出一筹。郑用锡晚年在新竹建北郭园，“士大夫之过竹塹者，倾尊酬唱，风靡一时”；（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四“郑

用锡传”)林占梅则筑有潜园,“士之出入竹塹者,无不礼焉,文酒之盛冠北台”。(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三“林占梅传”)二人还分别创设了诗社“竹社”和“梅社”、“潜园吟社”。在这些诗社中聚集了一批当地和大陆游台的诗人如郑如兰、郑用鑑、郭襄锦、林汝梅、杨浚、林豪、查小白等,成为台湾一支重要的诗歌创作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北部诗歌的发展。陈维英是道光、咸丰间台湾北部知名的文人和教育家,时人称他“执淡北文教之牛耳”。他擅长写作楹联,有口皆碑;至于其诗歌作品,则历来褒贬不一。他的诗常常写得诙谐有趣,不像其他教书先生那样板着面孔一本正经,这从本书所选的《半鸡》诗可见一斑。他的语言也有特色,既有奇崛的一面,又常用当地的方言俚语,有通俗的一面。由于陈维英拥有北台文教首领的特殊地位,因此尽管他的诗歌艺术总体上不及同时代的郑用锡、林占梅等人,但在道、咸间的台湾诗坛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台湾沦入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1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农历乙未年),当日军侵占台湾时,台湾人民奋起抵抗,与之展开了殊死斗争,上演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悲壮的一幕。近代台湾许多著名诗人如丘逢甲、许南英、施士洁、洪弃生、谢颂臣等,都是乙未台湾抗战的组织者或积极参与者。这场历史沧桑巨变,也使台湾诗歌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国家日渐衰弱,内忧外患不断,台湾有不少诗人开始意识到,诗歌不仅仅是表达个人情感和交际应酬的工具,而应该用来反映民生疾苦,表达对国家、民

族命运的关切，因此描写现实的作品较之以前明显增多。甲午战败和台湾沦陷的巨大创痛，更进一步激起他们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一时间台湾诗坛风起云涌，反对割让台湾，表现抗日军民英勇斗争，揭露日寇侵台暴行，表达念台爱国情怀，成了当时台湾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诗风也一变而为慷慨激昂、沉郁悲壮，杜甫、陆游、文天祥等人成为当时很多台湾诗人仰慕和效仿的榜样。

乙未抗日失败后，一些台湾诗人内渡到大陆，并在大陆坚持创作，以诗明志述怀；而众多留在台湾的诗人，也顽强延续着中国古典诗歌的血脉。从台湾沦陷到新文学兴起的这一段时期，台湾的古诗创作不仅未中断过，而且有更加发展的趋势。梁启超曾于1911年到台湾游历，对当时台湾诗社林立，诗人众多的情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沧桑后，遗老佗僚无所适，相率以诗自晦。”（梁启超《台湾杂诗·自注》），随着抗战的失利和日本殖民统治的加强，台湾的士大夫遗民在恢复无望的情况下，其心情由最初的激愤，逐渐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他们抱负难伸，但又不甘沉沦，不愿屈从于异族的统治奴役，因此往往佯狂诗酒以自晦自遣，这是当时台湾诗社林立、诗歌繁盛的重要原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日本殖民者在初期的武力征服后，为了消除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实现永久霸占台湾的企图，在岛内大力推行殖民文化，限制乃至扼杀中国文化。面对这种状况，一些有鲜明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诗人认识到，从事古诗创作，是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抵制异族文化入侵，反抗殖民者同化政策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他们纷纷组织起来

开展活动。这是乙未后台湾诗歌创作繁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努力，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连横曾经评价说：“（台湾）汉学颓衰，至今已极，使非各吟社为之维持，则已不堪设想。”（连横《嘏茗集》）不过与此同时，台湾诗坛也出现了“诗钟”盛行，击钵联吟成风的不良现象。“诗钟”（击钵吟）是一种集体性的创作活动，它要求作者在一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的题目、体裁、韵律写作诗歌或联语。这种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近代则首先在福建诗人中兴起，于道光、咸丰年间传到台湾后风靡开来。在种种严格的形式限制下，“诗钟”的参与者往往为应景而写作，其作品大多题材狭窄，内容空洞，形式呆板，只一味追求语言雕饰，带有明显的游戏色彩。可以说，“诗钟”的盛行严重损害了台湾古诗的品质。

甲午战争以来，台湾诗坛可谓人才辈出，其中既有内渡大陆的丘逢甲、许南英、施士洁等，也有在台的林朝崧、洪弃生、王松、胡南溟、林幼春等人。这些诗人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关于他们的事迹和作品，书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着重提一下几位较有影响的。首先是丘逢甲。他是台湾近代著名的爱国者，同时也是台湾本土出生而具有全国性声誉和影响的杰出诗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接受了新学的熏陶和民主革命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歌古今兼备，新旧相交，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情感。林朝崧是日据前期活跃在本岛的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多用比兴，风格蕴藉哀婉。林朝崧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创作上，他还发起创立并领导了台湾当时最重要的诗社

——“栎社”，推动了台湾诗社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为抵制殖民者的文化同化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栎社”成员有不少人后来还成为台湾新文化运动和民族抗日运动的中坚。不过林朝崧同时也是“击钵吟”的积极倡导者，虽然其初衷是“特藉是为读书识字之楔子耳”，（林献堂《无闷草堂诗存·序》引林朝崧语）但此举也给台湾诗坛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洪弃生是日据前期台湾著名的爱国志士。他在台湾沦陷后改名留发，以示不屈于殖民者，并穷其后半生致力于文史写作，以“扬大汉之声光，振民族之浩气”。他的长篇叙事诗如《割地议和纪事》、《台湾沦陷纪哀》等，是甲午、乙未事变的真实形象记录，堪称“诗史”。其诗歌艺术的高超和风格的多样，在当时也堪称出类拔萃。

以上就南明以来近300年间台湾诗歌的历史作了概要的介绍，下面再简单地谈一谈台湾诗歌的特点。

台湾的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自祖国大陆和台湾本土出生的诗人，把深厚的古典诗歌传统与台湾独特的风土民情相结合，创造出了既有中华文明底蕴又有台湾地方特色的诗作。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台湾是一个以大陆移民为主体的社会，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祖籍在大陆，它的文化也植根于大陆。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有过特殊的遭遇，但台湾诗人基于“祖籍意识”而生发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却从未削弱过，对祖国大陆这个母体社会和母体文化始终保持着强烈认同和归属感，而且越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这种情感就越

是强烈。我们从明郑和日据时期台湾诗人的作品中就能够明显感受到这一点。明郑遗民诗人作品中怀乡念土的深情，就与民族意识和祖国情结密不可分，而日据时期的台湾诗歌更是充满对异族的强烈抗争和对故国的怀念向往。另一方面，台湾由于其偏于东南海隅的特殊地理位置，从16世纪中叶以来就不断受到西方殖民者的侵扰，明末更被荷兰人强占。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实现了国家的领土统一，追随他来台湾的诗人也在此时把诗歌带到了台湾，因此台湾诗歌从一开始就与反侵略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近代发生的中英、中法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台湾也一直处在反侵略的最前沿。台湾诗歌对郑成功驱荷复台，中英、中法战争都有形象的反映，对乙未抗日更作了全面生动的记述和热情的歌颂。因此可以说，台湾诗歌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反帝爱国的宝贵传统。

台湾诗歌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或可称之为“乡土味”、“乡土气息”。这种地方特色主要体现在创作题材和内容上。无论是早期的遗民诗人、宦游诗人，还是后来的本土诗人，他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台湾本岛的景物和社会生活。由于地域的特殊性，台湾有着与大陆迥异的海岛风光和丰富的热带物产，靠海吃海的生存方式也与大陆内地以农耕为主不同，来自内地的文化和习俗在台湾因此演变出了一些特殊的形态，特别是居住于山区的土著居民，更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一切都构成了台湾诗歌特有的表现内容。此外，台湾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航海旅行惊险，这些现象也成为